论康熙末年清朝“驱准保藏”南路进兵方略*

杨代成

康熙末年清朝“驱准保藏”的军事行动能够最终取得圆满成功，经川藏一线的南路进兵方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南路进兵方略的提出与确立并不会早于清朝首次“驱准保藏”遭遇惨败之时。获悉惨败消息以后，清朝迅速确立南路进兵方略，并随之向西南地区的四川、云南进行大规模军事调动。同时，清朝开始积极经营沿线战略要冲，很快就将其控扼前沿向西推进近 1000 公里，为不久后南路大军顺利进抵拉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　清朝　四川　西藏　准噶尔　驱准保藏

作者杨代成，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兰州大学青藏高原人文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地址：兰州市城关区嘉峪关西路 9 号，邮编 730020。

康熙末年，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喇布坦派遣大策零敦多布率军经藏北高原远征拉萨，执杀清朝册封的拉藏汗，控制了西藏地区。康熙皇帝历经近一年的曲折决策过程，同意侍卫色楞孤军冒进的提议，并且信心满满地预期色楞能够率军一举驱逐盘踞西藏的准噶尔军。然而，事与愿违，色楞等人率领的近 4000 名清军却在喀喇乌苏河畔陷入重围，弹尽粮绝以后突围失败，覆没于青藏高原腹地。面对清朝定鼎中原以后少有的惨痛失败，康熙皇帝维护国家统一的坚定信念并未发生动摇。他深刻反思己过，总结经验教训，立足于充分、全面的准备工作，最终派遣大军兵分四川、青海南北两路进兵西藏，顺利驱逐了盘踞西藏已近三年之久的准噶尔势力。

关于康熙末年清朝“驱准保藏”事件，尽管学界已经形成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① 但是在南路进兵方略的一些问题上仍然存在进一步探讨的空间。有鉴于此，本文将在前辈学者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疆巡抚治疆史料长编”（21&ZD227）、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康熙末年清朝驱准入藏研究”（21LZUJBKYDX054）阶段性成果。

①　参见丁实存《清圣祖驱准保藏用兵始末》，《康导月刊》1945 年第 6 卷第 5—8 期；罗丽达《1717 年准噶尔侵扰西藏及清政府平定西藏的斗争》，《清史研究集·第 2 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2 年版；柳陞祺《十八世纪初清政府平定西藏准噶尔之乱始末》，《民族研究》1998 年第 1 期；邓锐龄《1720 年清军进入西藏的经过》，《民族研究》2000 年第 1 期；赵珍《论康熙末年清军两次入藏的战略选择》，《清史研究》2002 年第 4 期；宝音特古斯《十八世纪初期卫拉特、西藏、清朝关系研究——以“六世达赖喇嘛事件”为中心》，内蒙古大学 2009 年博士学位论文；邓锐龄、冯智主编《西藏通史·清代卷·上》，中国藏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石硕、王丽娜《清朝“驱准保藏”行动中对由打箭炉入藏道路的开拓》，《中山大学学报》2018 年第 3 期；Yingcong Dai, *The Sichuan Frontier and Tibet: Imperial Strategy in the Early Qing*,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9。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深入分析清朝确立南路进兵方略的背景与过程，清朝在川藏一线的政策变化与招抚沿线地方势力的细节等问题，敬祈方家批评指正。

一、另有深意的军事调动

康熙五十六年（1717）八月二十六日，康熙皇帝获悉准噶尔军远征西藏不及两月，即指出“地方遥远，消息到后，方调兵不及”，下旨“将荆州之军调二千往成都”。① 九月二十七日，2000 名荆州八旗驻防满洲官兵在军械、马匹等物资准备妥当以后，启程前往成都。② 十一月末，考虑到暂驻松潘口外的松潘总兵路振扬所部兵力单薄，③ 康熙皇帝降旨“他处军相距遥远，既尚未抵达，停止调遣”，命从进驻成都不久的荆州八旗驻防官兵中挑选精锐 200 名，迅速前往增援，“以做施威势”。④ 康熙五十七年（1718）一月，护军统领温普又奉命率领“荆州之五百名满洲兵”，“前往打箭炉驻扎”，⑤ 防范准噶尔远征军，并且威慑青海、康区等处蠢蠢欲动的地方分裂势力。

这些八旗官兵不仅及时缓解了准噶尔进军西藏之际川省军力有所不足的局面，更是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跟随定西将军噶尔弼进兵拉萨，直接参与了清朝再次“驱准保藏”的军事行动，为清朝的统一大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正因为如此，后世往往对康熙皇帝未雨绸缪，抽调荆州八旗驻防官兵前往成都的先见之明赞誉有加。但是，鉴于是时康熙皇帝对复杂的西藏局势尚无清醒认识，更不了解拉藏汗实已危在旦夕，⑥ 他作出抽调八旗官兵前往成都的决定，绝非已经有了经南路打箭炉等处进兵西藏的考虑。

此外，康熙五十七年三月，四川巡抚年羹尧曾于办理打箭炉八旗官兵军需补给的奏疏中提到“打箭炉地方外通西域，内皆高山峻岭，实为天设之险。皇上救援西藏，令护军统领温普带领满兵五百，赴炉驻扎。”⑦ 有学者又根据年羹尧所谓“皇上救援西藏”等语，指出康熙皇帝此时“已有从打箭炉进兵的打算”。⑧ 这一论断也与史实存在较大差距。

---

① 《议政大臣海金等奏报策妄喇布坦消息并请调驻军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232 页。

② 参见《将军拜音布奏报拣选兵马情形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1276 页。

③ 清朝遣军松潘口外，最初意在威慑青海蒙古诸部，尤其是于理塘达赖喇嘛转世灵童问题上再三推诿朝廷旨意的察罕丹津等人。

④ 《议政大臣苏努等奏为松潘等处调军及军需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1273 页。

⑤ 《清圣祖实录》卷 277，康熙五十七年正月庚申。

⑥ 康熙五十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康熙皇帝仍然乐观地认为准噶尔军很可能不敌拉藏汗，并将在无路可退的情况下“归降我等”。参见《议政大臣巴浑德等奏报策妄喇布坦侵掠拉藏汗情形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1259 页。但是，与康熙皇帝的乐观预期大相径庭，仅仅数日之后，拉藏汗即于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兵败身死。

⑦ 《清圣祖实录》卷 278，康熙五十七年三月丙寅。

⑧ 参见石硕、王丽娜《清朝“驱准保藏”行动中对由打箭炉入藏道路的开拓》，《中山大学学报》2018 年第 3 期。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康熙五十六年（1717）七月，四川巡抚年羹尧犯下严重政治错误，身陷当时极为敏感的孟光祖一案，并因辩解之时“巧饰不实”，奉旨革职留任效力。① 康熙五十七年（1718）初，依旧戴罪的年羹尧自然需要抓紧一切机会，竭尽所能地积极表现。是故，他借筹办打箭炉八旗官兵粮饷所上奏疏，主要意在显示自己办事得力，“必不迟误军需”。同时，他之所以会有“天设之险”“救援西藏”等语，无非意在恭维康熙皇帝见识高远、决策英明，并不能代表康熙皇帝本人的想法，更不能据此证明康熙皇帝已经有了从四川经康区进兵西藏的考虑。应该说，年羹尧的奏疏确实起到了他所期望的效果，康熙皇帝御览后当即下旨称赞他“甚为实心效力，殊属可嘉”，命他“复还原职”。②

实际上，相对熟悉自青海入藏的道路情况，西北陕、甘两省众多八旗、绿营驻军也便于就近调动，以及预期与青海蒙古等地方势力共同出兵等原因，③ 清朝始终将青藏一线作为当时进兵西藏的唯一选择。无论是康熙皇帝，抑或是朝廷大臣，都没有提出从四川经打箭炉进兵的计划。

还需要指出的是，清朝首次“驱准保藏”之际，清廷对准噶尔远征军持较为轻视的态度。康熙皇帝所谓“彼既可以到藏，我兵即可以到彼处。兵亦不用多，二百余人便可破之矣”，④ 正体现了这种态度。因此，朝廷在获知拉藏汗已经败亡，无须仓促赴藏救援的情况下，还是于康熙五十七年六月同意了色楞轻敌冒进的提议，并为他提前规划了“克取招地”以后所需采取的“恢复旧道”“抚绥民众”等一系列善后措施。⑤

康熙皇帝无论如何也没有料想到主要由强悍的八旗精锐及陕甘绿营组成，兵力与准噶尔军基本相当的清军，最终遭遇近乎全军覆没式的惨痛失败。可以认为，在获知前线清军惨败乃至战事不利的消息之前，信心满满的康熙皇帝必然不会多此一举，早在康熙五十六年八月抽调荆州驻防八旗官兵前往成都，或者康熙五十七年六月同意色楞进兵拉萨之际，就另辟蹊径，计划经并不熟悉的南路川藏一线进兵西藏。

既然康熙皇帝紧急抽调荆州八旗驻防官兵前往成都并非计划直接由南路川藏一线进兵西藏，那么除了在准噶尔进军西藏的背景下顾念“地方遥远”而未雨绸缪，以备不时之需外，是否有其他方面的考虑呢？答案是肯定的。此次军事调动实际上还有着更为深刻的用意。

康熙五十六年八月九日，四川提督康泰所属1200名绿营提标兵丁在松潘口外黄胜关柏木桥一带哗变，经附近的松潘总兵路振扬劝返无效，散还成都。⑥ 很快，康熙皇帝就通过路

---

① 参见王锺翰点校《清史列传》卷13《年羹尧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清圣祖实录》卷273，康熙五十六年七月辛酉。

② 《清圣祖实录》卷278，康熙五十七年三月丙寅。

③ 按照清朝的原定计划，青海诸王、台吉将派遣6000人随清军共同出征。另外，还有“绰克来那木查尔等所派唐古特之兵一万”，也将“一路前进”。参见《清圣祖实录》卷277，康熙五十七年二月庚寅；卷278，康熙五十七年三月癸亥。

④ 《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4，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甲戌，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

⑤ 参见《领侍卫内大臣海金等奏报进剿策妄喇布坦计划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1304页。

⑥ 若非松潘总兵路振扬安抚得力，此次兵变很可能激起更为严重的事端。因此，康熙皇帝高度赞许路振扬，称赞他处置“甚是”，路振扬也随之得以署理四川提督事务。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振扬密折获知兵变消息，亲笔朱批“朕自有旨意”。① 八月十九日，四川巡抚年羹尧具折说明此事，奏报抵京，康熙皇帝又作出“已有旨了”的批示。② 结合相应日期可知，康熙皇帝所谓“已有旨了”，无疑就是指八月二十六日他抽调 2000 名荆州八旗驻防官兵前往成都的决定。

九月二十日，康熙皇帝公开谈及川省绿营兵变，批评绿营兵丁“稍不如意，即至相怨”，“较满洲、蒙古，相去甚远。满洲兵只用二千，蒙古兵只用五千，朕亲统时，任意所向，绰然可以成功。若绿旗兵丁，任伊众多，朕心亦难倚任”，③ 明确表达了对八旗精锐的信任与对绿营官兵的不满。可见，康熙皇帝紧急抽调荆州八旗驻防官兵前往成都，除了希望在他看来所向披靡的八旗精锐能够妥善应对准噶尔军远征西藏可能导致的边疆危机，更有在四川绿营兵丁哗变的背景下，以八旗精锐监督、震慑川省绿营，避免溃散兵丁“鼓惑在省之兵，致生他衅”的考虑。④

有趣的是，康熙皇帝本人却否认他紧急抽调 2000 名荆州八旗驻防官兵前往成都与此次兵变有关，称“康泰之事未起以前，朕竟若豫知，调荆州驻防满兵二千名，往成都驻扎，意此时已到彼矣。”⑤ 然而，鉴于八月十三日松潘总兵路振扬具折说明此事并派遣亲信火速前往京师进奏，⑥ 康熙皇帝于八月二十六日下旨调兵之际，必定已经获悉兵变事件。⑦ 因此，他所谓“豫知”绝非事实，而是为了掩盖川省兵变之后，他进一步加深“凡地方有绿旗兵丁处，不可无满兵”的认识，⑧ 特别抽调八旗官兵震慑川省绿营的深刻用意。⑨

不久，考虑到川省绿营将领“万一领兵出口，难保不蹈前辙”，朝廷又“命副都统法喇前往四川，会同年羹尧料理军需”，⑩ 并于四日后即晋升法喇为镶白旗蒙古都统，⑪ 以期法喇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这批八旗精锐的作用，尤其是在震慑川省绿营兵丁方面的重要价值。

这 2000 名荆州八旗官兵的到来不仅为清朝应对四川、青海等处复杂的局面作出了一定贡献，更是强化了朝廷在西南地区的军事部署，有效震慑了刚刚经历哗变事件，军心浮动的川省

---

① 《四川松潘总兵路振扬奏报提标兵丁哗躁及安抚情形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7 册，档案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135—1139 页。

② 《四川巡抚年羹尧奏报提标兵丁在黄胜关鼓噪事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7 册，第 1147 页。

③ 《清圣祖实录》卷 274，康熙五十六年九月辛未。

④ 参见《四川巡抚年羹尧奏为晓谕提标鼓噪兵丁情形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7 册，第 1148 页。

⑤ 《清圣祖实录》卷 274，康熙五十六年十月己亥。

⑥ 参见《四川松潘总兵路振扬奏报提标兵丁哗躁及安抚情形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7 册，第 1139 页。

⑦ 自四川省城成都县县驿至京师皇华驿，共 4750 里。参见刘文鹏《清代驿站考》，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530 页。是时，路振扬当在四川北部松潘黄胜关一带，其奏折必能于 13 日内抵达京师。另，康熙皇帝朱批“朕自有旨意”而非数日之后的“已有旨了”，也说明路振扬奏折抵京时，他尚未下旨抽调荆州驻防官兵前往成都。

⑧ 参见《清圣祖实录》卷 274，康熙五十六年十月己亥。

⑨ 康熙皇帝还同时调遣 500 名八旗官兵前往西安，仅占调往成都的八旗官兵的四分之一，由此更可以看出他紧急抽调荆州八旗驻防官兵前往成都的主要意图所在。

⑩ 《清圣祖实录》卷 274，康熙五十六年十月癸卯。

⑪ 参见《清圣祖实录》卷 274，康熙五十六年十月丁未。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绿营兵丁，对于稳定当地社会秩序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有鉴于此，四川巡抚年羹尧指出“川省地居边远，内有土司、番人聚处，外与青海、西藏接壤，最为紧要”，而当地绿营系统的提、镇官兵却存在“心意不同，难于训练”等种种弊病，以“边疆既可宣威，内地亦资防守”为由，提议军务结束后在成都常设八旗驻防，获得朝廷批准，① 首开西南地区八旗驻防之先河。②

总之，虽然康熙皇帝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八月决策调往成都的荆州八旗驻防官兵确实是康熙五十九年（1720）四月清军兵分南北两路“驱准保藏”的重要兵源，但是此次调动主要意在震慑刚刚经历哗变的川省绿营，并不意味着康熙皇帝已经有了南路进兵的考虑。也正是因为如此，在2000名荆州八旗驻防官兵抵达成都以后的近一年时间，南路四川等处的清军除严密防范准噶尔远征军可能的侵扰，震慑打箭炉以西理塘、巴塘等处地方上层，防止他们在拉藏汗败亡之后倒向准噶尔部外，并未有更进一步的动作。实际上，如果朝廷早已有南路进兵的战略意图，那么南线清军绝不会在近一年的时间始终保持被动防御的消极态势。然而，随着首次入藏驱逐准噶尔的清军惨败于喀喇乌苏，这一局面迅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二、南路进兵方略的提出与确立

康熙五十七年（1718）十月上旬，清军覆没于喀喇乌苏河畔的消息传入京师。十月十二日，康熙皇帝在震惊之余，迅速命皇十四子允禵出任抚远大将军，计划由他坐镇西宁，全面主持再次“驱准保藏”的相关事宜。③

同年十月二十日，康熙皇帝指出“如明年大兵前进，则由松潘一路进发，而在成都驻扎之满洲兵止有二千，为数甚少”，下旨“将荆州之满洲兵再派一千，前往成都驻扎预备”。④ 十一月十三日，署理湖广总督事务满丕接到兵部咨文。二十八日，1000名八旗驻防官兵自荆州启程前往成都。⑤ 此时距康熙皇帝下旨抽调第一批2000名荆州八旗驻防官兵开赴成都，已经过去了一年有余。⑥

需要注意的是，所谓“松潘一路”是指经四川北部的松潘前往青海，再经青藏一线进兵西藏，与此后南路清军自打箭炉出口，经理塘、巴塘、察木多直趋拉萨的路线大相径庭。换言之，康熙皇帝下旨增调1000名荆州驻防官兵前往成都之际，仍然计划他们将由传统的

① 参见（清）鄂尔泰等修《八旗通志》卷28《兵制志三》，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② 是时，东北、北方、西北、中原、南方、东南等区域均已有八旗官兵驻防。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定宜庄认为“康熙末年为配合对准噶尔部作战，曾派荆州八旗驻防满兵入川，因设成都驻防”。参见定宜庄《清代八旗驻防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102页。这种认识不仅明显忽略了康熙皇帝最初决策抽调荆州八旗驻防官兵前往成都威慑川省绿营的深刻用意，更是无法解释何以清朝会于再次“驱准保藏”取得成功，川省面临的外部军事压力骤减的情况下，增设成都八旗驻防。

③ 参见《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5，康熙五十七年十月丙辰。

④ 《清圣祖实录》卷281，康熙五十六年十月甲子。

⑤ 参见《湖广总督满丕奏报驻省城荆州兵丁事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1341页。

⑥ 调赴成都的两批荆州八旗驻防官兵共计3000名，分别于康熙五十六年九月与康熙五十七年十一月离开驻地。有学者将两起事件误认为在同一年内发生，因而得出“短短两个月内，清朝就向成都派兵3000人”的结论以及早在康熙五十六年清朝就已于川省“为远征西藏开始做准备”等相关推论。参见石硕、王丽娜《清朝“驱准保藏”行动中对由打箭炉入藏道路的开拓》，《中山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北路青藏一线进兵，并未另辟蹊径，直接提出经川藏一线进兵的构想。但是，在年羹尧的提议下，① 朝廷不及两月就很快确立了新的南路进兵的重要方略。

大约在获知兵败消息以后不久，主政四川多年，熟悉当地情况，对西藏局势亦有一定了解的年羹尧建议朝廷“于松潘用满兵一千名，汉兵二千名，与西宁大兵合势，打箭炉亦用满兵一千名，汉兵二千名，与云南大兵合势，又两路护运汉兵一千名，四路进剿，贼必难支”，主张兵分南北两路从速进军西藏，一雪喀喇乌苏兵败之耻。② 年羹尧深思熟虑之后提出的这一计划符合客观实际，有着相当程度的可行性，因而获得议政王大臣会议批准与康熙皇帝高度赞许，“奉旨俞允在案”。③

康熙五十七年（1718）十二月，康熙皇帝明确表达了自己兵分南北两路共同进军西藏的考虑，降旨称“西宁、青海方面令大将军王阿哥，为进兵备驻，并宣布四川、云南、贵州之军前进，取地方之险固驻扎进兵”。④

康熙五十八年（1719）一月，朝廷大臣秉承康熙皇帝旨意，会议提出“云南不可无满兵”，决定“遣派江宁、杭州满兵各一千，遣协领各二人、佐领各四人、云骑尉等章京各四人、骁骑校各四人，督管军士，由江宁副都统吴纳罕、杭州副都统噶希率领”，经湖南西部的沅州前往云南，继而由云南中甸进驻川藏沿线要地，向“沿往招地之路”上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理塘、巴塘、察木多等处地方上层施加军事压力，迫使他们“坚守各自地方，勿降勿容准噶尔车凌敦多布”，“倘伊等降，则取其地方，遣人固守”。⑤

二月十三日，闽浙总督满保等人接到兵部咨文。二月二十五日，1000 名杭州八旗官兵即准备妥当，乘船前往沅州。⑥ 五月二十日，另外 1000 名江宁八旗官兵先于杭州八旗官兵抵达沅州，修整六日后继续进发。⑦ 这些调往云南的杭州、江宁八旗驻防官兵不仅进一步强

---

① 四川巡抚年羹尧提出两路进兵战略之前，曾于康熙五十七年十月初一日具折奏请康熙皇帝加授自己总督“虚衔”，以便管理川省绿营官兵。参见《奏陈营伍积弊请暂加总督虚衔折》，季永海等译校《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00—201 页。不久，已经获知喀喇乌苏兵败消息的康熙皇帝遂晋升四川巡抚年羹尧为四川总督。另，从年羹尧此折完全没有涉及四川巡抚（总督）必将扮演关键性角色的南路进兵方略也可以推知，清朝开始认真考虑南路进兵方略，必定不会早于康熙五十七年十月。

② 尽管不久后康熙皇帝深刻反思失败的经验教训，放弃从速进军西藏的考虑，并且及时遏止了包括年羹尧在内的众多朝廷大臣“务于来年齐备力量，报此怨恨之心”的冲动。但是，从朝廷调遣江宁、杭州八旗驻防官兵开赴云南，以及康熙五十九年自中甸出发的云南官兵与自打箭炉出发的四川官兵在察木多会和，共同组成南路大军直趋拉萨的历史事实，可以推知，年羹尧早在康熙五十七年末就已提出的兵分南北两路共同进军西藏的计划，是康熙皇帝最终战略决策的关键参考与依据。

③ 《四川总督年羹尧奏为再陈进兵西藏兵数等情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8 册，第 385 页。

④ 《和硕诚亲王胤祉等奏为办理军务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1350 页。

⑤ 《和硕诚亲王胤祉等奏为办理军务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1351 页。

⑥ 参见《闽浙总督满保奏报旗兵起程日期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1375 页。

⑦ 参见《湖广总督满丕奏报粮米收成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1405 页。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化了清朝在西南地区的军事部署，有效稳定了清军新败之际的边疆局势，还最终跟随定西将军噶尔弼等人进抵拉萨，为“驱准保藏”的军事行动取得圆满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

可见，在色楞所部遭遇惨败以后，朝廷才开始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抽调2000名荆州八旗驻防官兵前往成都的基础上，进一步向西南地区的四川、云南等地进行大规模军事调动。如此规模的军事调动，意味着清朝终于决定要在南路的川藏一线开辟新的进兵路线，与北路青藏一线的大军共同入藏，驱逐意图继续盘踞西藏地区的准噶尔势力。

随着兵分南北两路共同进军西藏的战略得以确立，此前朝廷对打箭炉以西理塘、巴塘等处地方上层的怀柔政策迅速发生了变化。

上文已经指出，康熙五十七年（1718）正月，2000名荆州八旗驻防官兵抵达成都不久，护军统领温普即带领其中500名前往川西门户打箭炉驻扎。① 鉴于此时朝廷尚未形成经川藏一线直接进兵西藏的意图或计划，此举既有防范准噶尔远征军侵扰的考虑，也有向打箭炉以西理塘、巴塘等处地方上层施加军事压力，防止他们倒向准噶尔部的目的。

正如朝廷预料之中的那样，准噶尔远征军控制西藏地区以后，准军首领大策零敦多布即遣使理塘地方，与当地营官、喇嘛等“暗通密信，诱伊归藏”。尽管随着都统法喇等人派遣员外郎巴特麻前往理塘“宣布圣主威德”，理塘上层在表面上已经“辑服”，但是由于准噶尔远征军进抵察木多一带，察罕丹津所属理塘宰桑又与准噶尔人“暗自通谋”，理塘堪布等地方上层对于是否彻底倒向准噶尔部，仍然在“未定”之间。②

有鉴于此，康熙五十七年五月，法喇等人奏请朝廷命驻扎打箭炉的温普挑选“满兵一百名”，“绿旗马兵一百名，鸟枪兵三百名”，分别由前锋参领伍林帕、化林协副将赵弘基等带领，“一同前往里塘弹压，相机擒剿”，获得批准。另外，为了避免理塘地方产生抵触情绪，朝廷还特命出身理塘的达赖喇嘛转世灵童之父索诺木达尔札遣人转谕当地“营官、喇嘛及居民人等”，告知他们“驻兵里塘乃圣主保护胡必尔汗之本乡，不使贼人惊扰，并无他故”。③

同年六月十六日，500名满汉官兵抵达理塘。④ 与此同时，经四川巡抚年羹尧奏请，朝廷又在理塘与打箭炉之间新设驿站，大大便利了理塘与中原的交通联系。⑤ 清朝驻军理塘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准噶尔势力渗透的趋势，并在搜集西藏局势的相关情报等方面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然而，这支驻军兵力相对有限，其主要目的也在于防备准噶尔远征军对理塘地区的渗透，因此，理塘地方上层并未因清军到来受到冲击，大都保持着他们原有的权势与地位。换言之，朝廷遣军理塘意在监视、震慑当地上层人士，而不是更为直接、有效地管辖与治理理塘。这清晰地反映出尚未计划自四川经康区进攻据藏的准噶尔势力前，清朝在川藏一线以被动防御而非主动进取为主的大政方针。

同年九月二十九日，色楞所部覆没于喀喇乌苏河畔，准噶尔军声势大振，本已相对稳定的理塘局势顿时紧张起来。考虑到一旦摇摆不定的理塘地方上层彻底倒向准噶尔部，当地驻扎的500名清军兵力单薄，恐有不测，十二月，四川总督年羹尧在向理塘地方首领达瓦喇木

① 参见《清圣祖实录》卷277，康熙五十七年正月庚申。

② 参见《清圣祖实录》卷279，康熙五十七年五月壬申。

③ 《清圣祖实录》卷279，康熙五十七年五月壬申。

④ 《转赍温普奏折并陈下情折》，季永海等译校《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第197页。

⑤ 参见《清圣祖实录》卷279，康熙五十七年六月辛丑。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札木巴强调务必“同内地军士友好行事”之后，仍然决定将“驻扎里塘之内地兵，撤至打箭炉”，① 仅留驻少数官员继续保持与理塘的联系。

这一事件充分体现了在表面的和睦之下，清朝对理塘地方上层的不信任态度。为数不多的驻军撤离以后，清朝对理塘地方上层本就较为有限的监视、震慑能力受到了极大削弱。但是，退却只是暂时的。随着南北两路共同进兵西藏的战略得以确立，清朝很快即改变此前在川藏一线以消极防御为主的战略态势，转而奉行积极进取的方针，计划在南路大军出发之前，预先控制理塘、巴塘、察木多等川藏交通的战略要冲。

康熙五十八年（1719）二月，都统法喇等疏言“里塘地方与打箭炉甚近，若遣官招抚，自当归顺，巴塘民心亦与里塘相似。遣官一员，先至里塘宣示威德，彼若倾心向化，即令开造地方户口清册，继至巴塘，亦照此行。若有观望不前者，于青草发时以兵临之，必不敢相抗。应挑选成都满兵五百名，令协领等带领，绿旗提标兵一千名，化林、永宁兵五百名，令永宁副将等带领，一同深入。虽巴塘以外，亦可传檄而定。若叉木多地方亦来归顺，则离藏甚近”。② 朝廷对法喇等人从速招抚理塘的主张表示赞同，却否决了他们提出的招抚不成再由协领、副将领兵前往理塘的计划，命法喇预先带兵“赴打箭炉驻扎，遣人招抚”，若有“观望不前”者，应亲自“带领官兵前进，攻取里塘、巴塘，即驻扎巴塘”。③ 此处有以下三个问题尤为值得注意。

第一，前已论及，早在康熙五十七年（1718）六月，清军就已进驻理塘，继而清朝又在理塘与打箭炉之间设置了驿站。虽然清军于是年十二月撤离，仍有部分官员留驻当地。在这样的背景下，法喇却提出“遣官招抚”理塘，朝廷也并无异议。可见，此前清朝在理塘的少量驻军只能起到相对有限的震慑与监视作用，理塘地方上层依旧保有相当程度的自主性，以至前线将领与清朝中央都不认为他们已经“归顺”朝廷。

第二，法喇所言反映出随着南北两路共同进兵的战略得以确立，为了保证南路大军顺利入藏及后续军需转运的通畅和安全，清朝已然下定决心完全、彻底地控制作为“四卫之要路”的理塘。④ 是故，非但理塘地方上层在清朝与准噶尔部之间首鼠两端已不能为朝廷所容忍，甚至他们名义上的归附也难以令朝廷感到满意。换言之，朝廷对理塘地方上层的态度已由此前的不倒向准噶尔部即可，转变为务必“开造地方户口清册”，亦即他们必须无条件地接受朝廷更为直接、有效地管辖与治理理塘的要求。

第三，主持川省军务的法喇等人认为理塘地方上层很有可能“观望不前”，不愿无条件接受朝廷的各项要求。因此，他们提出招抚不成则通过军事手段迅速解决问题，并预期这能够有效震慑理塘以西巴塘、察木多等处同样摇摆不定的地方上层，使得这些地区在成功招抚理塘以后“传檄而定”。朝廷对法喇等人关于理塘地方上层“观望不前”的预期表示认可，并命他亲自带兵“攻取里塘、巴塘，即驻扎巴塘”。联系此前喀喇乌苏兵败之后清朝紧急撤出理塘驻军的事实，可以推知，由于理塘地方上层始终在准噶尔部与清朝之间举棋不定，朝廷对他们的信

① 《胤祯奏办理里塘巴塘户口茶数等情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1424 页。

② 《清圣祖实录》卷 283，康熙五十八年二月辛未。

③ 《清圣祖实录》卷 283，康熙五十八年二月辛未。

④ 参见《条陈西海善后事宜折》，季永海等译校《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第 290 页。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任已经荡然无存。这也正是此后岳钟琪招抚理塘地方上层的行动出现波折的重要原因所在。

总而言之，相较于首次遣军入藏所经历的漫长且曲折的决策历程，朝廷在康熙五十七年（1718）十月上旬获知喀喇乌苏惨败消息的短短数月之内，即迅速作出应对，不仅很快意识到南北两路共同进兵的可行性与必要性，还确立了南路进兵方略，扭转此前在川藏一线的消极防御态势，准备积极经营理塘、巴塘、察木多等战略要冲。两次决策过程之间这种显而易见的差异性，充分反映了喀喇乌苏惨败对朝廷造成的震撼。

三、招抚理塘及后续措施

康熙五十八年（1719）三月，四川总督年羹尧依照朝廷指示，派遣知府一员前往理塘，会同理塘清军撤离以后依旧留驻当地的笔帖式一员，要求理塘地方首领达瓦喇木札木巴等呈递户口清册，同时上报理塘民众一年所用茶数，以便实施茶禁。可是，达瓦喇木札木巴等人却以“查得户口数难，一户一年用茶几多，一年确定用茶总数更难”为由，与朝廷官员争执不下，僵持一月有余。①

实际上，前方官员尚在理塘谈判之际，1500 名绿营及 500 名八旗官兵就已于康熙五十八年三月十五日在都统法喇带领下起程前往打箭炉，意在“攻克里塘、巴塘”。② 他们抵达不久，永宁协副将岳钟琪即先行率领 600 名绿营官兵直趋理塘。③

同年五月八日，岳钟琪率军抵达理塘。理塘总管达瓦喇木札木巴、第巴色布腾、第巴阿朱亲自率众迎接，与清军“相互友好会见”。十二日，达瓦喇木札木巴拜谒岳钟琪，色布腾、阿朱亦应岳钟琪要求，一同前往。岳钟琪设宴款待众人，表示“我等均如一家，仰圣主之恩，我等和好之今日同饮共食”，并向众人赏赐“绸、绫布、银牌”等各种物品。“食饭肉，劝饮酒”之后，岳钟琪在宴会上要求众人“务将里塘地方之户口数缮写，确定每年用茶数”。达瓦喇木札木巴等人当即同意并报告了“里塘庙每年用茶二万斤，七千户人一年用茶一万斤”等具体情况。接着，岳钟琪又提出“今圣主既遣我率兵来此处，尔等献首归顺圣主，将归降钤印文书，今即呈交”。达瓦喇木札木巴等人仍然表示同意，称“我等众人，乃至天下之人，皆圣主之奴才，我等达赖喇嘛之小灵童，今期圣主亲手教养，得享荣华。我等明日诸庙之喇嘛与达瓦共会，呈递归顺钤印之文书”。④

应该说，相较于此前面对朝廷知府、笔帖式时再三推诿，拒不配合的先例，岳钟琪率军到来以后，达瓦喇木札木巴等人态度颇为恭顺，在宴会之上全盘接受了岳钟琪提出的各项要求，双方之间气氛十分融洽。但是，宴会尚未结束，岳钟琪却突然“绑缚”总管达瓦喇木札木巴、第巴色布腾、第巴阿朱和他们的随从若干，与会的理塘人士除一名因醉酒先行返

---

① 参见《胤祯奏办理里塘巴塘户口茶数等情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1424 页。

② 《议政大臣议奏招抚巴塘里塘等事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1656 页。

③ 《岳襄勤公行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资料·第 4 辑》，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173 页。

④ 《胤祯奏办理里塘巴塘户口茶数等情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1424—1425 页。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回，另一名乘马逃出之外，全部被岳钟琪抓获。三日后，岳钟琪下令处决达瓦喇木札木巴、色布腾、阿朱及其他四人。①

上述岳钟琪招抚理塘的具体过程与细节，是由七世达赖喇嘛之父索诺木达尔札派往理塘的伊希、堪卓二人亲口向抚远大将军允禵供述。他们亲身经历了事件的全部过程，侥幸逃过宴会之上岳钟琪的抓捕，成功返回青海。正如二人面对允禵诘问时所指出的那样，他们“均系随从达瓦喇木札木巴前往此处之人，岂敢编造谎告，现所告之语，皆我等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之实情，并无谎编之处”，② 其供词具有很高的可信度。

然而，与伊希、堪卓所供大相径庭，事件的另一名亲历者岳钟琪却声称自己“一到里塘，即将达哇拉木渣木巴、第巴色布腾、阿住等传齐安抚，伊等出言抗拒，不给人口数目，因擒拿达哇拉木渣木巴、第巴色布腾、阿住并跟随之人。臣等随讯问伊等领兵前来，窃视我兵形势情由，俱各承认，理应奏请正法。但伊所调之蛮人众多，迟则恐生事端，故将达哇拉木渣木巴等七人俱已正法。随安慰里塘所属地方，并宣谕巴尔喀木等处”。③ 岳钟琪所言获得了朝廷认可，成为此后这一事件相关历史书写的主要依据。诸如“钟琪奉檄前驱至里塘，达瓦喇木札木巴、第巴塞卜腾、阿住不受抚，诛之”，④ “岳钟琪前驱，至里塘，第巴不受命，诛之”⑤ 等具有重要影响的记载，无疑均是源自岳钟琪的陈述。

根据满文档案文献中伊希、堪卓二人的供述，可知岳钟琪所谓达瓦喇木札木巴等人“出言抗拒，不给人口数目”，绝非历史事实。那么，岳钟琪何以会在达瓦喇木札木巴等人已经明确表示归顺，同意缮写户口、确定茶数，约定次日会同“诸庙之喇嘛”，郑重“呈递归顺钤印之文书”的情况下，突然于气氛融洽的宴会之上抓捕他们，并在数日之后未经请示即擅自处决他们呢？事件的亲历者伊希、堪卓对于“达瓦喇木札木巴、第巴色布腾、阿朱等先前虽于知府、笔帖式取户口、茶数时未报，后将户口、确定茶数报岳副将，将归顺之文书报之，而仍思斩杀”也深感不解，只能将之归咎于与达瓦喇木札木巴关系不睦的理塘堪布的所谓“诽谤之语”。⑥

实际上，伊希、堪卓二人并未参透其中要领，岳钟琪看似不符常理的行动并非草率之举，而是有着复杂的历史根源与深刻的用意。

第一，虽然早在近一年之前的康熙五十七年（1718）六月，清朝即已驻军理塘，但是由于理塘地方上层在清朝与准噶尔部之间秉持两端，态度游移不定，朝廷对他们存有很高的警惕，甚至一度于喀喇乌苏兵败后撤出了理塘驻军。康熙五十八年，在朝廷已经确立南路进兵方略并开始积极经营川藏一线的背景下，达瓦喇木札木巴等人仍然拒不配合四川总督年羹尧派往招抚的官员，这不免令朝廷失望。因此，岳钟琪出发之前很可能就已受命便宜行事，自行处置“观望不前”的理塘地方首领。纵使他率军抵达理塘以后，如朝廷预期那样“不

① 参见《胤祯奏办理里塘巴塘户口茶数等情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1425 页。

② 《胤祯奏办理里塘巴塘户口茶数等情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1425 页。

③ 《清圣祖实录》卷 284，康熙五十八年六月丁巳。

④ 王锺翰点校《清史列传》卷 17《岳钟琪传》。

⑤ 《清史稿》卷 296《岳钟琪传》。

⑥ 《胤祯奏办理里塘巴塘户口茶数等情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1425 页。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敢相抗”的达瓦喇木札木巴等人态度恭顺，全盘接受他提出的所有要求，也已为时太晚。

第二，严惩曾经“观望不前”的理塘地方上层，能够对理塘以西巴塘、察雅、察木多等处同样态度暧昧的地方上层形成有效的警示与震慑作用，加速他们归附朝廷的进程。康熙五十八年（1719）二月，都统法喇等人提出招抚理塘的建议时，就已指出通过军事措施底定理塘，则不仅“巴塘以外，亦可传檄而定”，距离拉萨“甚近”的察木多也很可能顺势归附。① 是故，岳钟琪初到理塘即假意安抚总管达瓦喇木札木巴等人，使他们放松警惕，继而在宴会之上轻易地“计擒”所谓“首逆达哇蓝占巴等，并其喋巴二人”。②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岳钟琪声称他捉拿达瓦喇木札木巴等人后，因“伊所调之蛮人众多，迟则恐生事端”，故未能奏请康熙皇帝即将他们处死，迅速稳定了理塘局势。③ 言下之意，似乎他仅仅处决区区数人，即成功招抚理塘，并未引发其他“事端”。而据私人著述记载，岳钟琪除了出其不意地抓捕并紧急处决数名理塘地方上层外，还“杀散助逆番兵三千余众”，理塘“其余部落”方才集体“纳款请降”。④

第三，理塘原属云南丽江府管辖，“三藩之乱”时为青海蒙古控制。此后，青海蒙古“恐内地清查”，遂将之布施与五世达赖喇嘛。⑤ 随着准噶尔入藏，西藏的世俗统治者拉藏汗败亡，他所拥立的六世达赖喇嘛益西嘉措亦遭到废黜，理塘在很大程度上陷入了权力真空的境地。

鉴于拉藏汗任命的理塘堪布与准噶尔部暗通款曲，青海蒙古拥立的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又系理塘地方生人，在朝廷授意下，灵童之父索诺木达尔札与青海蒙古察罕丹津等人派遣达瓦喇木札木巴前往理塘，成功取代理塘堪布，总管当地各项事务。尽管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准噶尔部对理塘的渗透，却也进一步强化了达赖喇嘛转世灵童集团在理塘的影响。正因为如此，岳钟琪率军抵达以后，才会特意强调“达赖喇嘛乃众人公祭之喇嘛，不可称主”。虽然达瓦喇木札木巴等人立即明确表示“我等众人，乃至天下之人，皆圣主之奴才”，但是理塘地方“众人均诚意，以小灵童为主”⑥ 的普遍认识却不能不引起朝廷警惕。

进而言之，如若岳钟琪径直接受理塘上层归顺，则意味着与索诺木达尔札和青海蒙古察罕丹津关系密切的达瓦喇木札木巴将继续总管理塘。这不仅有违朝廷完全、彻底地控制理塘地区，保证南路大军顺利进兵西藏的初衷，更是会为成功平定西藏，达赖喇嘛转世灵童赴拉萨坐床以后，理塘地区的统属问题埋下严重隐患。⑦ 因此，无论达瓦喇木札木巴等人何等恭顺，朝廷都势必要

---

① 参见《清圣祖实录》卷283，康熙五十八年二月辛未。

② 《岳襄勤公行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资料·第4辑》，第173页。

③ 参见《清圣祖实录》卷284，康熙五十八年六月丁巳。

④ 《岳襄勤公行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资料·第4辑》，第173页。

⑤ 参见《四川总督年羹尧奏为再陈进兵西藏兵数等情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8册，第386页。需要指出的是，青海蒙古察罕丹津等依旧在理塘地区有着相当的影响力。

⑥ 《胤祯奏办理里塘巴塘户口茶数等情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1424、1425页。

⑦ 康熙五十九年南路大军进兵西藏，云南丽江府土司木兴与应袭世职之子木崇不仅亲率属下众多土兵从征，表现积极，还采取恐吓当地民众等各种方式，竭力试图将岳钟琪主持招抚的理塘、巴塘重新纳入丽江府管辖之下。主张将两地划归四川的川督年羹尧获悉，严词参劾木兴等人，获得朝廷高度重视。然而，未待朝廷予以正式处置，木兴与木崇二人就在“惊悸”之中相继“病故”，理塘、巴塘重归丽江府管辖的动议也随之作罢。参见《木氏宗谱》，《二十三世考》，美国国会图书馆藏1931年彩绘抄本。此外，七世达赖喇嘛噶桑嘉措也曾奏请朝廷将理塘等处划归自己的管辖之下，但同样遭到了朝廷有理有据的拒绝。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取消他们原来的地位，继而另行委派理塘各级首领。这也正是达瓦喇木札木巴等人同意缮写户口、确定茶数、呈递归顺文书的情况下，岳钟琪却仍然在宴会之上抓捕他们的关键所在。

处决达瓦喇木札木巴等人后，岳钟琪在理塘地方主导设置了“堪布”与“正、副营官”等职务，分别负责“专理黄教”“董率地方”。新任理塘地方官员根据他的指示，“开造本管大小堡寨十五处，头人三十名，百姓五千三百二十户，大小喇嘛寺院四十五座，共喇嘛三千二百七十余众”之清册。① 与此同时，理塘周边的“五处酋长”也“各呈户口，上纳粮马，革面来归，情愿趲运军粮”。② 至此，朝廷终于将理塘地区纳入更为直接、有效的行政管辖之下，确保理塘民众能够按时“输纳贡赋，承应差使”，为此后南路大军顺利进抵拉萨提供了重要的后勤保障。

随着理塘局势迅速稳定，岳钟琪又遣人至巴塘招抚。同时，他还马不停蹄地继续西行，很快便率军抵达巴塘所属立登三木巴地方。面对理塘上层遭到处决的前车之鉴与清军已然兵临城下的现实，巴塘首领喀木布第巴表示“情愿归顺”。岳钟琪遂“准其投诚，并令喀木布第巴开明户口数目，俟大兵一至巴塘，即来亲递”。③ 据记载，岳钟琪“总统四川绿旗官兵”抵达巴塘时，“该地碟巴、头人、僧俗百姓迎师，倾心投诚，愿作天朝子民。开呈本管地方寨堡三十三处，头人三十九名，百姓六千九百二十户，大小喇嘛二千一百一十众，按年上纳粮赋，承应差徭，挽运军糈”。④ 康熙五十九年，南路大军进兵西藏，当地民众更是“竭力争趋，随军趲运”，为供应大军军需补给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值得注意的是，康熙五十八年（1719）三月，朝廷在遣官招抚理塘的同时，还通过册封等方式展开对巴塘以西地方上层的招抚工作。据藏文档案文献记载，三月十四日，康熙皇帝敕封察雅地方的杰·洛桑朗杰为“广衍释佛弘法诺门罕”，并为他驻锡的寺院赐名“格丹扎西曲宗”。⑤ 三月二十九日，康熙皇帝再度降旨，敕封察木多地方的帕巴拉转世丹白尼玛为“阐讲黄法额尔德尼诺门罕”，并为他驻锡的寺院赐名“甘丹强巴林寺”。⑥

尽管康熙皇帝在敕书中绝口不提已经统治西藏地区一年有余的准噶尔势力，表示自己之所以册封帕巴拉活佛等人，是鉴于此前他们“对朕所派测量冈底斯山者支应乌拉、食宿等，提供诸多便利”，⑦ 但这显然不过是他欲行册封的借口罢了。毫无疑问，在喀喇乌苏新败与朝廷已然确立南路进兵方略之际，康熙皇帝接连敕封川藏一线具有重要影响的格鲁派高僧活佛，其用意无非在于进一步强化他们的国家意识，尽可能地争取他们的支持乃至归附。可是，在首次入藏的清军惨败于喀喇乌苏，损失非常有限的准噶尔军依旧较为稳固地统治着西藏地区的背景下，朝廷的册封可能起到了一定效果，却并未立即获得积极响应。

然而，随着理塘总管达瓦喇木札木巴等人遭到处决与巴塘首领喀木布第巴迅速归附，这

---

① （雍正）《四川通志》卷 21《西域》，哈佛燕京学社藏乾隆元年刻本。

② （雍正）《四川通志》卷 21《西域》。

③ 《清圣祖实录》卷 284，康熙五十八年六月壬戌。

④ （雍正）《四川通志》卷 21《西域》。

⑤ 《康熙帝赏赐杰·洛桑朗杰诏书之抄件》，西藏自治区档案馆《清代西藏地方档案文献选编》第 1 册，中国藏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7—8 页。

⑥ 《康熙为嘉奖昌都帕巴拉特赐名号印册等事谕旨》，西藏自治区档案馆《清代西藏地方档案文献选编》第 1 册，第 8 页。

⑦ 《康熙为嘉奖昌都帕巴拉特赐名号印册等事谕旨》，西藏自治区档案馆《清代西藏地方档案文献选编》第 1 册，第 8 页。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一局面很快就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康熙五十八年（1719）九月，察雅、察木多、嚓哇三处呼图克图罗布藏那木扎尔等人主动联络暂驻巴塘的知府迟维台，① 将“伊等所属喇嘛、民人等户口，会造总册投递”，正式归附朝廷。四川总督年羹尧随即“差郎中鄂赖、游击黄喜林等，持银牌、茶、缎，轻骑前往三处”，“晓谕犒赏”当地首领并“详察三处形势”，② 积极为此后南路大军经此直趋拉萨收集各方面情报。

总之，虽然岳钟琪招抚理塘的行动并非全无波澜，但他秉承朝廷严惩理塘地方上层的指导方针所采取的雷霆手段，确如朝廷预期那样产生了有效的震慑作用，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巴塘、察雅、察木多等战略要地迅速归附，甚至还与此后南路大军进兵西藏的过程中，沿途地方望风归顺密切相关。正因为如此，清人也高度评价岳钟琪平定理塘之举，称赞此举使得“我兵军威远震西藏，沿途一带，酋长纷纷迎师归诚”，③ 将之视作南路大军能够兵不血刃地率先进抵拉萨的重要原因所在。

结　论

康熙五十九年（1720）四月，经过长期、充分、全面的准备工作，清朝兵分南北两路，再次展开“驱准保藏”的军事行动。其中南路大军分别由四川与云南出发，在察木多一带会合后“整队进发”，④ 完全未曾经历正规作战即于康熙五十九年八月二十三日进抵拉萨。⑤ 北路大军则由西宁出发，经青海索洛木、木鲁乌苏等处进兵西藏，途中挫败准噶尔军三次偷袭，于九月十四日顺利护送达赖喇嘛转世灵童抵达拉萨。至此，准噶尔势力在西藏地区近三年之久的统治正式告终，清朝随之将西藏地区纳入中央政府更为直接、有效的管辖与治理之下。

清朝再次“驱准保藏”之所以取得近乎“一矢不发”的辉煌胜利，⑥ 当然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在这诸多因素之中，面对喀喇乌苏之役的惨痛失败，朝廷能够迅速认识到南路进兵方略的可行性与必要性，立即于传统的北路进兵路线之外规划新的南路进兵路线，进而一改此前在川藏一线的消极防御态势，开始积极经营川藏沿线的战略要冲，于半年时间即将实际控扼前沿由打箭炉推进到察木多一带，向西推进几近 1000 公里，无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最后，还需要指出的是，清朝于传统的北路进兵路线之外开辟新的南路进兵路线，不仅使得西藏的准噶尔势力腹背受敌、顾此失彼，确保了“驱准保藏”最终取得圆满成功，更是为增进四川与西藏之间的各方面联系，以及朝廷治理西藏的过程中四川得以发挥日渐关键的作用创造了有利条件，推动了清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巩固与发展和中华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进一步深化，具有极为深远的历史影响。

〔本文责任编辑　樊志强〕

① “罗布藏那木扎尔”即上文提到的杰·洛桑朗杰，系第四世察雅活佛。

② 《清圣祖实录》卷 285，康熙五十八年九月甲戌。

③ （雍正）《四川通志》卷 21《西域》。另，乾隆元年，岳钟琪已然获罪。故此典籍中涉及他的记载一般略去姓名，仅以永宁协副将、副将等职务代之。

④ 《卫藏通志》卷 13 上《纪略上》。

⑤ 参见《卫藏通志》卷 13 上《纪略上》。

⑥ 参见《清圣祖实录》卷 294，康熙六十年九月丁巳。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On the Qing Dynasty's Administration in Xinjiang …… Xu Jianying Liu Zhijia (88)

The article sorts out the challenges the Qing Dynasty faced in geopolitics, ethnicity, borderland, culture, and economy in administrating Xinjiang, and sums up the administrative institutions and policies, as well as their characteristics, effect, and problems, holding that on base of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Qing developed institutions and policies with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which had an important function in Xinjiang's administration. However, Qing's administration was rooted in tradition, there had not formed a continuing dynamics in Xinjiang'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which influenced the integration of society.

Key Words: the Qing Dynasty Xinjiang Administration

Initi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Burut Tribe Edegene …… Chen Zhu (100)

The initiation of relations between Qing and the Burut tribe Edegene was the consequence of Qing army's pacifying rebellion of the Khoja Brothers. Before official establishment of their suzerain-vassal relationship, in order to attack, intercept and catch the Khoja Brothers, Qing began to contact and interact with one of Edegene's branch tribes Kara Bagysh and the main part of Edegene. And then they dispatched initial envoy to each other officially. On the basis of Manchu archive records, this paper inspects these issues thoroughly, analyses deficiency of Han-Chinese sources, corrects errors of previous research, and reveals all the details of relevant history.

Key Words: the Qing Dynasty Burut Edegene Daktana Khoqand

On the Strategy of Marching through Southern Route in Military Operations of the Qing Dynasty to Expel Dzungar Troops and Protect Tibet during the Late Reign of Kangxi Emperor …… Yang Daicheng (111)

During the late reign of the Kangxi Emperor, the strategy of marching through southern route from Sichuan to Tibet played a vital role in Qing's military operations to expel Dzungar troops and protect Tibet, which finally achieved a complete success. The proposal and establishment of this strategy would not be earlier than the first failed attempt to expel Dzungar troops. After learning of the disastrous defeat, the Qing Dynasty determined this strategy and subsequently carried out large-scale military mobilizations to Sichuan and Yunnan in the southwest. At the same time, the Qing Dynasty began to actively take control of strategic locations along the Sichuan-Tibet route and quickly pushed its controlled front line to the west for nearly 1000 kilometers,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smooth arrival in Lhasa soon after the army marching through southern Route.

Key Words: the Qing Dynasty Sichuan Tibet Dzungar Expel Dzungar Troops and Protect Tibet

Urgent Need of the Military and State: Research on Interprovincial Financial Aid for Yunnan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 Peng Jian Tong Weixiong (124)

After the Qing army entered Yunnan, the military cost was huge, plus the long transportation distance, being overdue and in arrears became normal for interprovincial financial assistance for Yunnan. After the territory was basically pacified, with the withdrawal of Manchu troops, the adjustment of green camp soldiers, land reclamation and copper casting and other practical implementation measures, although Yunnan is still a recipient Province, Yunnan's military expenditure and interprovincial financial assistance have had dropped. After the insurgency of the Three Feudatories, Yunnan's interprovincial financial assistance had been maintained at about 500, 000 Liang for many years. The practice of Yunnan's military expenditure and interprovincial financial assistance system shows that although there were many drawbacks in interprovincial financial aid system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it effectively integrated the limited financial resources in wartime, ensured the progress of the unified war of the Qing court, and established the dual financial model of "local fund-raising plus interprovincial financial aid" for the governance of the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